

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的构建与调试

鹿瀚文 孙晨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东日照 276800)

摘要: 新主流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中, 以其鲜明的文化属性与叙事策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本文从文化身份理论出发, 探讨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构建与调适机制。新主流电影既通过文化符号的植入强化本土文化的认同, 又通过普世价值的表达架构与异域文化的情感共鸣。在影像叙事中, 民族身份与全球视野交错融合, 既传递了文化的独特性, 又展示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然而, 跨文化传播并非一帆风顺, 它需要在文化摩擦与误读中寻找平衡点, 并在多元化观众的视角下持续调适自我。本文试图揭示新主流电影如何在多层次文化语境中实现“本土—全球”的双向互动, 并探讨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文化共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新主流电影; 文化身份; 跨文化传播; 艺术范式

随着《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长津湖》《满江红》等电影不断冲上热搜, 并在国外票房上取得成功, 近两年一种新的“主流”电影类型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它不似传统主旋律电影充满“说教”意味的样板戏模式, 一味宣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用固定的脸谱化形象和模式化的故事情节阐述主题, 而是进一步在电影的审美性和商业性上找到了平衡, 用一种全新的视角, 在日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宣扬东方美学及中式英雄, 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探索出了新的出路。

“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 最早在1999年由电影评论家马宁提出, 他认为面对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 应该考虑制作发挥中国“主场”优势低成本高回报的“新主流电影”。在日后的发展中, 新主流电影虽反复被个体提及, 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 直到2016年11月17日,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振华以及《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围绕“新主流电影”这一命题展开深入探讨, 并发表《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文章, 由此业界才慢慢达成三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是其意识形态表达由单一走向多元, 表现出一种普世情感的传递, 如张卫特别指出: “新主流大片在观念上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全球观念和人类意识, 诸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法制等”, 第二是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达成统一, 能够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上取得成功, 如尹鸿、梁君健认为: “新主流要完成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 是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第三是新主流电影需要达到“新”的水准, 应能代表电影产业最新的工业制作水平, 如梁振华就谈道: “制作水平低下, 投资规模与影响力偏弱, 不符合当前电影工业水准的电影也不属于新主流大片。”虽然新主流电影当今仍处于摸索阶段, 没有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 但它身上在跨文化传播中凸显出的强大潜力早已破壳而出, 而尝试从文化身份理论的角度去解读它, 可能会为未来其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一、新主流电影文化身份的建构

文化身份理论的提出是对多层次社会文化现实的反映, 回应了全球化、现代化和多元化语境中的文化张力和身份挑战。⁵ 这一背景促使学者们从动态、历史性和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构建过程。文化身份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虽其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 但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文化身份是流动且动态的”观点, 强调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不断重构。⁶ 就像在新主流电影的发展过程中, 新主流电影一方面传承了传统主流电影的大众性与娱乐性, 以通俗化的叙事和高质量的制作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 它又植

根于本土文化, 注重展现民族特色、历史传承和社会价值, 以增强全球观众的文化认同感。电影通常以国际观众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复杂的文化意象, 强调全球通用的主题, 如爱、和平、奋斗与希望, 从而实现文化共鸣。那在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文化身份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是值得被思考的问题。

(一) 用文化符号强调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自我认知, 还是通过语言、行为、图像、风格等符号在文化交际中建构和表达的。新主流电影在跨文化传播时, 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符号系统与国际观众建立认同。其实, 电影中的语言、服饰、历史符号、家庭关系和传统仪式等, 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象征性表达传递本土的文化价值观。⁷ 而这种符号认同的构建不仅能够使观众感受到文化的根基, 还能通过熟悉的文化符号和情节产生共鸣, 帮助跨文化理解。

(二) 用故事叙事建构身份张力

新主流电影的故事叙事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身份理论, 其独特之处在于兼容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双重诉求。电影善于通过叙事结构的精巧设计, 将民族文化的深层意涵植入普世价值的表达框架之中。例如英雄主义、家国情怀等主题在叙事中被赋予象征意义, 不仅唤起本土观众的情感共鸣, 也为国际受众提供了理解文化内核的切入点。

从整体来看, 新主流电影在叙事语言上追求多元化与普适性, 在叙事主题上兼顾民族性与全球性。通过情节设置、角色塑造与视觉表达的多层次融合, 这些影片在彰显文化身份的同时, 也让中国故事以一种更具有吸引力的方式融入全球语境, 完成了从“讲好故事”到“讲好文化”的升华。

(三) 用人物形象打破身份隔阂

新主流电影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 将文化身份理论注入叙事深处。这些形象兼具象征意义与人性共通性, 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还在跨文化传播中搭建理解与情感认同的桥梁。从群体英雄到小人物, 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女性, 每一种形象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符号, 深刻诠释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 小人物: 微观叙事中的情感力量

新主流电影擅长通过普通人的视角, 展现宏大历史中的个体命运。《我和我的祖国》便是这种叙事手法的经典代表。片中《相遇》篇章, 讲述了科学家高远因保密任务不得不与爱人分离的故事。这一角色不仅还原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真实, 更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 展现了个人抉择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冲突。这种张力是中国文化身份的生动体现: 个人永远与集体命运相连。这样的微观叙事为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情感共鸣的元素。高远的隐忍与牺牲, 不仅能引发本土观众的历史记忆, 也让国际观众从人性化的故事

中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小人物的命运映照大时代的洪流，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2. 父子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在《流浪地球》中，刘培强与刘启父子的关系塑造了一种富有张力的文化身份表达。父亲刘培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舍己为人”与“家国同构”精神，他的牺牲不仅体现了责任感，也象征着长辈对后代无私的爱。而儿子刘启则是新生代的象征，他的叛逆、冲突与最终的成长，既呼应了现代语境下的个体独立性，也通过代际传承的情感和解，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纽带的强大力量。这种父子关系的描写，不仅让本土观众感受到浓烈的家庭情感，也通过普世化的情感表达拉近了与国际观众的距离。父与子的对立与和解，是东西方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的主题，但《流浪地球》将这种情感置于全球危机的背景下，赋予其更深的文化层次。

二、文化身份理论助力新主流电影跨文化传播启发

新主流电影的崛起不仅彰显了中国叙事体系的自信，还在文化身份理论的框架下，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启示。这些电影通过多层次的叙事结构、符号化的文化元素以及情感共鸣的全球化表达，开辟了一条在国际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路径。它们的成功，映射出文化身份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深远意义，同时也为其他类型电影的文化输出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要善于运用多元文化进行身份的动态呈现

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建构、解读和重塑。新主流电影深刻理解这一点，通过多元文化身份的动态呈现，让本土故事具备国际传播的可能性。这些电影打破了单一文化叙事的局限，将本土文化符号与国际化表达有机融合，为全球观众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体验。回到《流浪地球》这部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其文化身份塑造可以带来很多思考。影片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地球被拟人化为需要守护的“家”，人类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得失。然而，影片并未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阐释，而是通过对全球化语境的巧妙嫁接，将这一理念扩展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在影片中，“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这一壮阔的科幻设定不仅是剧情发展的驱动力，更是对“东方文化身份”进行动态诠释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的牺牲与责任精神放置于全球背景下，使其成为全人类可以理解的价值观。在刘培强的个人牺牲中，父亲的责任被升华为拯救人类的使命，这种情感表达突破了文化边界。而联合国多国科学家的出现，进一步体现了多元文化合作的可能性，强调了在灾难面前的人类共存意识。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哪吒之魔童降世》提供了另一个典范。影片以中国古代神话为蓝本，却在叙事上进行了极大的颠覆：哪吒不再是天命所归的英雄，而是一个不被世界接纳的“异类”。这一设定让观众既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根基，又能对其产生现代性共鸣。影片中，哪吒的反叛姿态打破了传统神话中“天命论”的束缚，展现了现代观念中的个体自主性与抗争精神。这种塑造使其文化身份不再局限于“中华传统”，而成为一种具备普世价值的叙事——在任何文化语境中，渴望挣脱偏见、追求自我认同的故事都能够被理解和接受。

文化身份的动态性呈现出一个核心启发：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地输出文化，而是通过重新审视、解读与重构，将自身文化转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动态构建能让新主流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了独特的文化高地。

（二）文化自信与传播策略的创新

文化身份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对文化自信的强调。文化身份理论确实强调个体或集体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和文

化归属感，它认为文化身份是个体或群体在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关于身份的认知，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同盟感。这一理论框架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其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有效传播，并塑造文化自信。首先，文化自信在新主流电影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更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力量，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的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传播本土文化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可以帮助电影产业建立起对外传播的信心和能力，使得在呈现文化内涵时，既不失其独特性，又能引起跨文化观众的共鸣。例如，中国电影在近年来的崛起中，正是凭借着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文化自信的坚持，逐步走向国际舞台。总的来说，文化身份理论对新主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独到的启示。在文化自信的引领下，电影制作方能够更有信心地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精准的传播策略则帮助其跨越文化边界，赢得全球观众的认可。通过高多样性和高节奏感的方式，电影能够有效地调动不同观众的情感与认同，最终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共鸣。

三、结语

电影中的文化身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它并非单一的符号或象征，而是在文化互动中不断流动与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新主流电影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置，使得文化身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而是进一步拓展为全球视野中的多重交汇点。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不仅揭示了文化认同的构建机制，还展示了身份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演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建构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对话的过程。电影制作者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视觉语言，激发了观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是新主流电影所呈现的独特魅力所在。通过这种文化冲突和融合，电影赋予了文化身份新的定义和维度，打破了单一文化叙事的局限，展现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构建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更是对文化交流的深刻反思。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不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多元的互动与对话。

参考文献：

- [1] 马宁. 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 [J]. 当代电影, 1999 (4) : 4
- [2] 张卫, 陈旭光, 赵卫防等. 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 [J]. 当代电影, 2017 (1) : 5
- [3] 尹鸿, 梁君健. 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 [J]. 现代传播, 2018 (7) : 84
- [4] 张卫, 陈旭光, 赵卫防等. 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 [J]. 当代电影, 2017 (1) : 14
- [5] 杨生平, 谢玉亮. 时代全球化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审视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02) : 181-185.
- [6] Bhandari N B. Diaspora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conceptual review [J].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21: 100-108.
- [7] 宋梦凡, 董秀玲. 乡土电影中语言符号对人物角色塑造的——以贾樟柯《山河故人》的作用为例 [J]. 戏剧之家, 2022 (35) : 141-143.